

# 前提·问题·破题：高校德育 与公共人培育之耦合同构

吕文欢, 魏继才

(湘潭大学,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之耦合同构命题提出的核心旨归在于扭转大学生公共向度的沦落式微之势。二者耦合同构命题的成立在逻辑理路上互构共荣,即在育人结构优化上二者延异互构,相互有效嵌入并成为对方整体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在育人功能提升上二者属性对接,在二者基因属性互通互融互补互成中实现相互赋能进而激发功能叠加的倍增效应;在育人伦理规范上二者并非价值中立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伦理规范、道德约束等价值负荷。后乡土社会高校德育与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工作耦合协同需要突破“群”“己”关系尺度失衡之困、“同”“异”审视偏差之困、话语权单向度之三大梗阻困顿。在厘清梗阻的基础上提出从“群”“己”极化走向“尺度平衡”、从“把握通约性”走向“尊重异质化”、从“围剿”走向“共存”的路径图景,最终期待高校德育与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工作共荣共建,产出“1+1>2”的育公共人之耦合效应。

**关键词:**后乡土社会;高校德育;公共人;耦合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5)02-0095-07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5.02.006

后乡土现代化生活在增进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彰显主体精神与自由意志的同时,也割裂了大学生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交融关系<sup>[1]</sup>,淡化了对来自公共领域的责任答应。高校德育是培养大学生公共精神的一项基础性底色工程,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和伦理规范等维度寻求公共人培育与高校德育耦合之逻辑机制,发现该耦合命题之困境,提出该耦合命题之优化路径,进而提升培养独具个性、异质鲜活“公共人”群体的实效性,打破“个体人”困顿局面。

## 一、耦合命题的提出:厘清大学生公共精神式微之“真”“伪”争论的分歧点

学界对后乡土社会大学生公共精神现状的讨论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高阶转化说”认为,大学生公共精神并非衰落,借助于网络公共领域新空间实现“变身”的大学生之公共性愈加强大;“悬空消隐论”认为,社会的“个体性”转型、高校教育的功利性与网络空间的“反公共性”造就孤立个体性的“凯旋”映射出大学生公共精神的“消隐”。

(一)高阶转化说:大学生公共精神借助于网络公域实现高阶转变与嵌入再生

该观点并不认同桑内特所提出的“大众传媒促使更多的

公共领域退缩至私人领域”的论断。公共领域由独立完整个体和群体化责任取向组成,后乡土社会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公共领域不仅是一种现实性样态的“责任域”,而且独立完整的个体(网络公民)与群体性的责任取向(网络舆论)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隐现<sup>[2]</sup>。

1. 现实存在的独立完整个体,即大学生积极开展自我言说与表述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接近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8.0%<sup>[3]</sup>。大学生作为网络空间内容的使用者与创作者,创造着现实之外的多重虚拟身份。网络交往的“失重”状态破除了大学生在现实交往中外在重力(如身份、学历、年龄等)束缚,弥合着“在场”与“缺场”的间隙,为“现实我”的隐身创造了有利条件。数字智能技术的赋能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场域融合与场域转换,多样化文化景观与多元化思想意识在虚实交融的场景空间中得以完整立体呈现。去中心化的数字智能技术环境往往能够生成个性化、扁平化和交互化的交往情境,有助于大学生多元主体间充分的思想表达、意见置换和情感输出。大学生在网络公共空间上发表言论、传递观念、维持

收稿日期:2024-06-14

基金项目: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新时代学校国防教育体系和效能研究”(编号:AFA230021)。

作者简介:吕文欢,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原理;魏继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后,哲学博士,军事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国防教育。

群体性联系,甚至号召现实性联合行动,此时的言说与行动或许对现实生活意义不大(例如点赞、转发、互粉与评论),但不能否定这是一种个体寻求社会意义托付的现实努力。

2. 表达群体性责任取向之中介的网络蛰伏,即网络语言的生成与传播

公共表达借助于公共理性在表达内容上关注公共利益,在形式上则要求借助于公共话语体系进行“言说”,网络语言逻辑的生成与扩展拓宽大学生个体走向公共生活的基本通道。作为网民共识的符号和表达方式的网络语言赋予网络表达更多的公共性味道,大学生的自我表达借助于网络语言逻辑各转变成一种具有社会公众意愿表达的群体性言说。通过借助于网络语言进行谦虚而谨慎的言说,大学生个体从周遭网络世界沉默的大背景中凸显出来,并一呼百应,形成多元交互的公共话语主体群,开辟出网络公共话语场。正是基于此种意义,网络公共舆论得以显现,网络空间追求“善”的公共性被激活。

3. 展现群体性责任之现实回应,即大学生个体与现实社会公共性互动的增强

网络空间继互粉、点赞、转发与评论出现的更深层次的“声讨”“承诺”“倡议”等更具行动意义的行为,进而出现网民以网络公共事件为发肇端由在现实公共空间聚集以促使网络事件的合理解决。更加凸显出大学生个体的网络行为并非个体人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托付,更多地体现个体对公共事件的责任回应、对公共利益的捍卫之自我展现。因此活跃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大学生群体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公共意见或公共舆论,人与公共群体及公共事件之间形成鲜活互动,因而互联网赋力公共空间实现更高阶形态的能动性转变和嵌入性再生。

(二)悬空消隐论:后乡土社会大学生个体性的“凯旋”反衬公共精神的“悬空”

在后乡土社会,国家的后缩、公共领域的削减和人际关系的松弛推动国家与公民关系模式重组,消解着大学生个体的“他在性”维度,催生着以“自恋者”“旁观者”“消费者”为主要特征的“个体人”的膨胀。该观点主要从社会转型、高校教育以及网络空间反公共性的二律背反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支撑。

1. 社会层面:“总体性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型之感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中国社会的观念结构出现了由“总体性社会”趋向于“个体化社会”转型之感,后乡土社会的大学生不再被“捆绑”于社会、集体设定好的标准化生活模式中,社会情境的“碎片化”及生活追求的“插曲化”把大学生从共同体、集体的束缚与羁绊中解放出来,个体人成为更加民主、自由的“解放”的个体人。个体化社会转型的副作用

是大学生主体性和独立性不受社会规则和群体利益的约束<sup>[4]</sup>,大学生个体在关注自我体验感和享受欲的同时,淡化自身“他者”意识,甚至排斥自身所扮演的公共角色和承担的公共责任,不免罹患“以自我为中心”为特征的“唯私主义综合征”,分解消弭公共精神,造就了精神孤独、情感封闭个体人的“出场”。

2. 高校教育:学生个体性膨胀与高校公共性异化之困

(1) 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追求“投资与收益”共在的功利性经营场所

高等教育的消费化、产业化是其公共性平庸化的重要表现,以专利和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制度使知识具有商品性,本该共享的学术公共资源转换为带有资本性质的群体性甚至个体性资源,高校知识的公共性和自由共享受制于市场原则和产业制度,产权制度对学术活动的裹挟使高校在获取权益的同时,也牺牲了公共性。此外,大学生的学业成绩、科研成果及就业率不仅能决定个人前途命运,而且称得上是教师与家长的“杰作”。接受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学生、家庭与学校讲究投入产出比的投资和消费行为<sup>[5]</sup>,考试与实习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身体与灵魂对知识与道德的意义确证,而是被异化扭曲为对投资成功与否的验收。正是基于一些人奉行教育由“功利”到“功利”的演变逻辑,故导致高校更懂“经营”,高校教师更懂“训练”,在校大学生更懂“应试”,带有功利味道的师生交往和学术创作也构建着大学生利己式的精神生活状态。

(2) 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展开“火拼与竞赛”共存的排他性竞技场域

“功利性消费场所”的在场性伴生出“排他性竞技场域”。在“教育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知识,为了在竞争中优胜他人”<sup>[6]</sup>的病态氛围中,高校开展的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不断制造孤独冷漠的个体者和自私自利的竞争者的个体竞技化竞赛活动<sup>[7]</sup>。作为“教育工厂”的高校看似并非自始至终主张分享性、合作性的公共生活空间,相反工具理性的扩张制造着“你”“我”个体间与“我们”集体间分割而不联合的分化紧张状态。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布里克(David C. Bricker)所言:“学习科目和演练习题是一样的,但学生往往以孤独、分离式的方式完成学业任务,他们很少进行交流合作。”<sup>[8]</sup>原子式个体化的隔离和分裂状态逐渐消弭、遮蔽大学生共同体意识,校园公共生活的生态在很大程度上由原来的全民式转变为个体式。

3. 网络空间:“公共性与反公共性”交织之谜

网络空间的交互性、扁平性与开放性延展了公共参与平台,赋予话语边缘与话语弱势大学生群体更多“言说”机会,为多元思想观念的碰撞以及公共议题的诞生提供讨论空间,

尽显公共性。网络空间存在的信息垄断、非对称的话语能力、数字资本主义等现象也在塑造新的权力结构,网络空间的再中心化伴随网络空间去中心化而来,即网络空间内公共性与反公共性交织存在。由于大学生在知识结构、信息资源及参与能力等方面存在悬殊差异,本来处于原子化状态的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开展公共参与所引发的公共关注与获取的流量存在差异与分化,且呈现的分层分流之势不断拉大,最终构建出新的“权威意识”叙事框架。经过网络公共舆论的筛选与聚焦,新一轮的意见领袖掌握了高度话语权和积极的流量通道,“一家独大”式的意见领袖逐渐走近并掌控公共参与的话语中心。网民大学生所进行的价值判断、网络发声与行为抉择过程与结果易被意见领袖左右,很容易使情绪、观点、评价、态度朝着极端方向偏离转化,引发大学生“群体性吐槽”与“集体性迷失”,这一过程也是占据绝对数量的大学生围绕少数意见领袖形成网络空间多极化的“再中心化”异化过程<sup>[9]</sup>。

(三) 亮点观点:后乡土社会“公共人”式微之势虽缓但行

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的演进与转型实质上是乡土性渐进式嬗变和后乡土性嵌入性再生的动态复合过程,从社会转型的趋势中把握“公共人”的历史流变轨迹,不难发现后乡土社会公共人呈式微之势,但不可否认网络公域的存在对大学生公共精神式微之势有减缓之效。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10]</sup>。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呈现出以血缘关系为主轴向外扩延的人伦差序格局图景<sup>[11]</sup>,突出的特征就是讲究“人情往来”与“守望相助”。村落共同体中有共同的生活习惯与集体记忆、遵循共同伦理秩序的社会个体基于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及姻亲关系形成较为紧密的情感与道义联系。社会个体深深嵌入在家庭网络和亲属网格等“先赋性人情圈”中,直系亲属、近亲以及姻亲构成“先赋性人情圈”的核心区域,交往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家族集体主义。在家族是联系国家、社会和个人中枢的情形下产生以家族特性浓厚为主要特点、以家族或泛家族共同体(村落)为价值本位的家族公共人。家族公共人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自发形成的具有狭隘性的公共人,主要表现为家族公共人具有对家人漠不关心、对族外利益幻想侵占的个人主义情结。此外,因受制于族权统摄与控制而丧失完整自由的独立个性人格,注定难逃现代化的洗涤与冲击。

经历了市场化、现代化转型,乡土社会的“乡土本色”似乎正在淡化,文化观念和行为已受到现代化渗透<sup>[12]</sup>,后乡土时代大学生个体的价值观念与行动取向越来越少地遵循乡土逻辑,越来越多地拥抱市场逻辑。利己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公共关怀的掣肘诱发大学生公共理性的缺位,导致大学生

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存在样态由“整体中的个体”转向为不受所谓传统乡土关系伦理限制的“独立行动者”,其在人际格局层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个体对实用性与经济性的“理性化”追求<sup>[13]</sup>。故不难理解“00后”大学生从“断亲”到“搭子”社交需求转向发生的现实性,“断”不仅反映物理空间上的“脱嵌”与“疏远”,更是公共情感上的“断链”,“搭”是大学生秉持公共交往建立自主性人际关系的“再嵌”行为,即大学生在打破“先赋性”网格人际关系束缚的同时,注重“后致性”的“自我主义化”人际关系再建构。富于理性算计的大学生在追求利益的冲动下产生“自我主义化”的社会人际关系导致后乡土社会大规模“集体性自我”的破碎和社会个体对“自身”或自身所属的“小集体性”的回归。

基于上述分析,在乡土性消解与后乡土性生成视域下厘清大学生公共精神式微之“真”“伪”争论的分歧点与模糊点,阐明网络时代大学生公共性向度式微沦落之势虽缓但行的主要观点。高校德育是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高校德育赋能驱动。

## 二、耦合命题之逻辑理路

促进结构优化、推动功能提升、明确伦理规范是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建立同构关系的耦合点。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关系既不能简单把高校德育看作既定工具的“拿来主义”,也不能粗略简约为提升公共人培育实效性的“实用主义”,二者并非简单的前后二者相互点缀装饰关系,而是在结构、功能与伦理维度的正向互塑与耦合建构。

### (一) 结构优化:高校育与公共人培育的延异互构

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延异互构是在二者差异化的交互运动中实现有机统一的过程,结构是构成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组织形式,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相互有效嵌入并成为对方整体结构重要组成部分是耦合命题成立之前提条件<sup>[14]</sup>。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地把德育嫁接到公共人培育抑或将公共人培育引入高校德育,而是“高校德育”与“公共人”不间断地发生公共人高校德育化和高校德育公共化的往返交互运动,即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在延异互构中不断进行要素重构和结构再塑,进而实现要素融合与能量传递。在公共人高校德育化中,高校德育的属性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并贯穿公共人培育的全过程,赋予公共人培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承载;高校德育公共化的核心是公共化,是指将公共人培育的方式方法、价值理念等嵌入高校德育系统中,强化高校德育“育公共人”之整体框架。

### (二) 功能提升: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属性对接

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属性对接是在二者基因属性

互通互融互补互成中激发功能叠加的倍增效应。功能是一事物满足某事物需要的属性,一般指向其所发挥出的正向作用。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耦合命题的成立与提出不仅是一种行为、一种期待,更是一个注重结果和回报的过程。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双方包含对彼此的承诺与归属,高校德育能够实现公共人重回视野的期待是耦合命题成立目的、意蕴之节点所在;公共人培育工作之价值归旨、方法理念、场域支撑等如果不能为高校德育所接人和纳悦,那么“1+1>2”的耦合互嵌力量也不能淋漓尽致,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正向相互赋能关系正是基于二者功能属性的相通对接。

### (三) 伦理规范: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价值负荷

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价值负荷是在高校德育要素与公共人培育活动相互作用中所彰显出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创造。高校德育自诞生之日起充当的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担负着社会伦理价值取向,承载着特定道德规范要求。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的耦合缘于学校德育价值取向的正当性。高校德育价值包括由其自然属性决定的内在价值负荷和由社会属性决定的外部价值负荷。在高校德育过程中嵌入公共伦理价值取向,通过将公共伦理价值内置于高校德育中,实现对学生个体(准公共人)道德约束前置化,以有意识有目的的价值导向有预见地促进高校德育正当性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 三、“耦合”命题之现实困境

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育耦合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说服力,该耦合命题虽然在理论上深度耦合,在逻辑上相互贯通,但从总体上讲,耦合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是系统的,主要包括构建尺度失衡之困、“同”“异”审视偏差之困、话语权单向度之困。

### (一) 构建尺度失衡:培养对象陷入“极化”之困

“极化”之困主要是指高校在开展培育公共人之德育工作过程中割裂群己关系,出现“群”殖民“己”(极化)或“己”僭越“群”(负极化)追求一端的失衡现象。公共人的应然状态是公共性与个体性相统一平衡,当培育对象的“群”性与“己”性出现失衡时,就有可能出现个体人公共性的“极化”或者“负极化”现象。“极化”就是指人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无限膨胀以致影响私人生活、挤占私人空间,成为心中只有“公极”的人,以集体为尺度,以满足集体要求为最高价值。“负极化”是指单向度个体人私性的膨胀及公共人角色的蜕化,社会公共性“奄奄一息”的人失去了公共精神向度,即从“神圣”回归世俗的同时,价值信仰取向负极化,所奉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最高德育价值是发展人、维护人、满足人,以个人需要、欲望和情感为先。

高校德育与公共人培养的耦合节点成型的前提并非奉行“公共性”对“个体性”的替代,而是在基于人的独特的公共存在方式、承认大学生是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张力性存在的前提下思考如何防止个体人的膨胀与异化。在后乡土时代高校德育中依然隐约存在“群”“己”失衡现象。其一,在主张打造将共同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社群主义共同体优先论的显性话语背景下,“公”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轴。在某些场合中高校德育主体习惯性地“私”装扮成异己的、遭人“围攻”的“反派”。其主要表现为高校德育主体以共同体名义反对个人(大学生),提前预设统一规范的公共人意象模型,强调大学生无条件服从共同体或集体,并以形式上的自愿遮蔽现实中的被迫,通过“集体化人格”来压制、打击、消解合理性的“私”的存在。其二,人本取向范式研究者在“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一切”的美好口号下涉嫌公开为个人主义辩护,试图构建人的“完整图像”。“现实的个人”是其论证群己关系的逻辑起点,然而有些人学取向范式研究者所理解的“现实的个人”实际上只是“个体的个人”,奉行德育之个体价值即其对个人的有用性的观点,体现到高校德育主体上就是最大限度满足受教育者的个体需要和受教育者个体价值最大限度的实现。如此一来,部分奉行人学取向范式的高校德育主体提出“德育的个体价值才是现代德育的本质功能”<sup>[15]</sup>,并在“个体发展论”的指导下痛斥集体主义,其目的就是要“把过去那种强化组织和领导、漠视甚至扼杀个人的虚假集体主义完全颠倒过来”<sup>[16]</sup>。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高校德育主体在处理群己关系时也会强调要警惕滑向个人极端主义,但是这并未避免其提出的某些观点滑向“己统驭群”的个人主义一端<sup>[17]</sup>。

### (二) “同”“异”审视偏差:批量生产“无差别”公共人

“现实的人”和“人”存在根本上的区别,公共人培育工作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人”,“同”“异”审视偏差主要是指用同质无差别的公共人取代精神气质各异鲜活的个体人,具有公共精神、秉持公共理性的大学生本该因“异”而聚,个体异质性是个体的共同选择。“个体”最原初的中性语义概念是具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伦理生物<sup>[18]</sup>，“个体性”概念就是异质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所呈现出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个体性与公共性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交叉互嵌式、包容互构的有机关系,即公共性并不贬斥个体性,且需要与多元鲜活个体性在公共空间共生共存。高校德育主体强调把大学生作为出发点,但大学生生活的世界却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强调要从大学生本身出发去研究大学生的主体性、需要、利益、素质等问题,但他们所讲的主体性、需要终究只是个体的主体性、个体的需要、个体的利益。

高校德育课堂上师生“教”与“学”的互动是一种具有公

共性质的交往活动,通过平等方式展开合作来获得知识传递与精神塑造的共同快乐体验感。而以知识获取为导向的做法值得反思,高校德育主体忽视了对师生教学交往过程中合作、关怀、尊重品质的关注,甚至将大学生在社会交往中展现出的无好坏之分的异质化特性与公共性对立化,将带有社会权威性的公共性胁迫、裹挟大学生个体性的存亡。从本质上讲,大学生的发展就是个性的发展,高校德育促进大学生发展其实就是促进其个性发展。在某些课堂场景中,高校德育主体认为大学生个体性彰显的潜台词就是自作主张、不讲求合作,既然固执、自作主张、不讲求合作,那就要及时进行所谓的“纠偏匡扶”,例如,高校德育教师就以预设考不出好成绩(甚至挂科)为筹码进行胁迫。大学生屈服于高校德育主体的胁迫而选择“相信”不是因为学生认识到“合作”的意义,而是高校德育主体将道德品质的教育预设化,并且以个人正当利益(大学生的正当成绩)的剥夺为要挟,强迫大学生接受高校德育主体预设的答题思路(或某些道德准则),大学生才会在身体到场的同时看上去显得“听话”“乖巧”。在高校德育主体注重个人“炫技”的课堂上,高校德育主体将公共人教育虚化并悬浮、外嵌于课堂之上,大学生在个体性合理诉求被无视、自主体验被忽视、私己性道德品质被泯灭的前提下以一种“无我”的存在样态被迫进行着非自主式的选择与服膺。

### (三) 话语权单向度:公共人成为单纯的语言符号

这里的单向度“话语”是一种既包括语言也包括非语言的“推理性实践”。在高校开展培育公共人的德育活动中,不管是从学理逻辑上推理,还是从现实场景中观察,“被抛放”是大学生的一种常态性甚至宿命性遭遇。高校德育主体借助于尊师传统的道义赋权途径获取事实上的“父权”地位,学生天然具有被规制管理地位之差势。可以说在高校德育活动中,大学生作为“被抛放者”自进入高校的那天起便被“抛放者”——高校德育主体“抛放”到给定课堂场景中,这就先验决定大学生“言说”和“行动”很可能遭受高校德育主体不同程度的压制与剥夺。在认同海德格尔“人被抛入世界”这一生存主义哲学洞见的基础上,聚焦于高校德育视角,明确指出高校德育主体的抛放者角色,重在凸显高校德育主体的意志、权威、甚至是“蛮霸”及相伴而生的大学生的被迫、压制甚至剥夺<sup>[19]</sup>。高校德育主体与大学生“强 VS 弱”的关系、高校德育主体与大学生之间天然知识范式的地位差势,更多时候并不会因大学生被“抛放”何种给定的课堂场景而异。

在“被抛放”的校园环境中作为“被动化”存在的大学生面对高校给定的德育主体、提前设定好的课堂场景只能展现出带有内在抵制性的、敢怒不敢言的缄默与顺从,这种顺从既非内心真正的屈从,更不是惟命是从性的遵从。各方面

“力量”逊于高校德育主体的大学生在课堂上选择“迁就”特定场所抛出的带有一定权威性的德育教师,其角色可能由“行动者”转变为“无为者”,控制真实情感外放,师生间本该“亲密”的交往也变成了“不得不”进行或者非进行不可的“冷亲密”交往。在公共人培育过程中,在高校德育主体把握课堂话语权的情境下,高校德育主体“强悍”施加影响的过程与大学生“怯懦”应对影响过程相互碰撞、交织与作用,其间充满了师生的合作与博弈、相互猜测与推断、相互发问与怀疑。

在大学生“被抛放”的课堂环境中,高校德育主体为避免学生的“干扰”往往具有相对权威,更倾向于在课堂上以“最有效的方式”与学生开展所谓的精神交往活动,以此保证公共人塑造过程的“顺畅性”和育公共人之精神结果的“高效性”。大学生是一种被动化、被打压、被宰割的孤立存在对象,其个体性、自由性是被压制、束缚、禁锢、遮蔽的,甚至是被“围剿”的。大学生难以“言说”,更难以“行动”,公共人及其培育看似成为单纯语言符号。

## 四、“耦合”命题之优化路径

(一) 从“群”“己”极化走向“尺度平衡”:匡正个体性“己”的正向功能

“己”性既是生命个体的基本特征,也是人之为人存在的一般本质与实践追求。“群”与“己”、“公”与“私”的对立并非天然存在的,而是囿于认知的偏差与观念的束缚。因此,要澄清“群”与“己”、“公”与“私”之间的内嵌张力,消弭“己”“私”的个性化彰显与“群”“公”主导价值观统合要求之间的裂痕和隔阂,在正视、尊重和兼顾多元价值的基础上谋求一元主导的价值共识点。

作为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托付的公共性是非人格化的公共性、有社会教养的公共性,体现的是大学生个体社会性的后天属性集合;而个体性(私人性)是满足人与生俱来自然属性的先天属性集合。公共性与个体性并非一去一存、形而上学的机械斗争关系;相反,“公利”与“私己”是矛盾着的对立同一、互补平衡关系。如果脱离“己”的个人需求,则为“空”,造就了育“假大空”之公共人的低效;如果脱离“群”来培育公共人,则为“盲”,抹杀了公共人培育的本质规定。贬斥个体性,往往会道德主义地看待公共人及公共精神,陷入狭隘、单纯、肤浅的朴素道德主义。

只有在集体中,大学生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个人和集体不是谁优先于谁的问题,个人和集体不是简单的前提、基础和中介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共生的交融关系。“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

两种利益是敌对、互相冲突的”<sup>[20]</sup>。“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离开了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生产,现代社会的运作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能理解的<sup>[21]</sup>。

不少学者在后乡土社会公共精神式微的社会背景下反复强调大学生公共性是对个体性歧变的有力匡正,大学生个体的个体性只是能够实现自然人的自在本性,只有具备公共性,大学生才能追求和实现更高水平的大众性卓越与更文明的社会性出众,因此要肯定大学生个体“己”对公共“群”的有益补充作用,追求群己“共同在场”的二重性表征形式。公共人不是从属、附庸于公共(国家、集体、学校)的人,而是秉持公共精神、心怀公共责任的生动鲜活个体,是“己”在摆脱“群”的工具性束缚的前提下对公共精神的理解与确认。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必须以个体性与公共性双重统一的“完完整整”个体人为前提,后乡土社会带有个体性色彩“己”的正向功能在高校开展公共人培育工作中应被肯定,在既非自私自利也非无限利他中追求“群”“己”关系和谐<sup>[22]</sup>,而非否定甚至抹灭合理“己”性的存在,以防出现大学生个体生活价值的离散化、边缘化、无根化倾向。

(二)从“把握通约性”走向“尊重异质化”:谋求公共人的诗意栖居

高校德育活动培养的蕴含公共精神的大学生并不是改组建设者、接班人的本性甚至剥夺其独立性,公共人是在公共性和个体性之间保持适当张力性、非同质的人。在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体化的过程中培养最初意义的、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的大学生独立个体,在心中有“你”“他”“我们”的前提下,寻求公共主体间和谐有序相处。“异质”(而非无差别)个体的社会化既是高校开展德育活动的核心旨趣,也是个体获得自由和基础的保障,并非限制公共人作为社会基本个体独立发展的羁绊与梗阻。带有伸缩性与开放性的异质大学生个体都承载着以个体性为基础的公共精神,但也必然存在以公共善为最高道德原则。公共人的培养并非通过泯灭大学生个体人的方式来将其通约化为高度抽象、僵化呆板的统一标识,千篇一律的同质个体人是乏味空洞的,所以任何用单一法则或者统一标准来实现公共人通约化把握与培育的做法都是荒谬的。

高校德育主体培养大学生个体的公共性要尊重并孕育大学生个体自我生长的内在本真“纹理”,不可因追求简化为无差别共同性或者单一集体性而泯灭作为个体自然纯粹本真的差异性、多样性、独特性。公共生活的意义是关系性的构成,所谓的“公共性”是相对于“个体性”而存在的,正是在这种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差异性结构关系中,承载并生产着意义。要充分认识到越是丰富健全的个体性就越会成为公共

性提升的资源,反过来又引导着个体性丰富发展,这种彼此悦纳与交往成为大学生公共精神保持鲜活的动力源。

(三)从“围剿”走向“共存”:主动调试、适度让渡“话语权”

面对“被抛放”的大学生,审视大学生“被抛放”后“无声胜有声”的反应,作为抛放者的高校德育主体应当深刻反思。高校德育主体在公共人培育过程中应主动调试、适当让渡“话语权”,促成话语权样态的多向度转变,达成主体间性理想状态,最大限度改善与“被抛放”大学生的关系。将给定的课堂情景作为高校德育主体(或学校)的统划,不可能不体现高校德育主体(或高校)意志,但大学生精神意志不能为高校教师主体意志所统摄。在一个“优质”给定的德育课堂环境中,高校德育主体(或高校)意志应最大限度契合大学生成为“公共人”之需要,对大学生进行话语“赋权”。一个优质的高校“育”公共人之课堂应“共存”四种气息。其一,大学生气息。给定的课堂作为大学生生成公共人之所,不应该只体现高校德育主体(或高校)、家人、社会之期待,更要呈现大学生最本真纯粹的姿态与样貌。其二,自由气息。“育”公共人之课堂需要规范,但个体(大学生)为了获得自由而必须遵守社会(课堂)规范在本质上是一种外生、被动的自由观。规范的核心旨趣在于保障大学生的共同自由,并非强制性地把德育个体打造成社会所需的特定模型意象的公共人。自由归根结底是公共生活及公共规则基础上的自主选择及行动<sup>[23]</sup>,对公共性的追求反对将大学生简化为高度抽象的统一符号。其三,平等气息。在“课堂”这一给定场所中,所有成员之间(特别是高校德育主体与大学生)的关系在成(公共)“人”之机会及社会价值上都应是平等的。不能允许漠视、歧视甚至“宰割”大学生的现象,只有在生态式的平等自由课堂氛围中,公共人的精神实质才能融进大学生的精气神。第四,民主气息。培养大学生公共精神课堂的运行需要尊重、调动大学生行动主体积极性,而非把德育对象(大学生)当成“有用且温顺”的社会工具,而非以全程监管式的“规训化”教育为手段单向“围剿”大学生主动精神与主体地位。

#### 参考文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思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
- [2] 陈可翔.互联网公域治理结构转型与行政组织法发展[J].东方法学,2022(5):74-88.
- [3] 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 [2024-08-29]. <https://news.cctv.com/2024/08/29/ARTIV5SscNSBZ1v1wUtMdJWR240829.shtml>.
- [4] 冯建军.公共人及其培育:公共领域的视角[J].教育研

- 究,2020(6):27-37.
- [5]曹辉,徐留红.从“自恋者”到“公共人”:论德育如何打破个体化桎梏[J].教育评论,2022(6):17-22.
- [6]叶飞.从“个人”到“公共人”——论道德教育如何培育人的公共品格[J].教育科学,2019(1):16-22.
- [7]李宏亮.公共人:消解学生个体存在紧张的意义中介[J].当代教育科学,2012(9):3-5.
- [8]DAVID C. Bricker, Classroom Life as Civic Educa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9:4.
- [9]阎国华,何珍.公共性与反公共性:网络空间公共参与的悖论与破解[J].理论与改革,2022(6):133-146.
-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
- [12]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9.
- [13]赵泉民,井世洁.“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J].江西社会科学,2013(8):203-208.
- [14]王学俭,冯瑞芝.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逻辑及风险防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7-45.
- [15]雷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4.
- [16]石义斌.试论人学的兴起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J].理论探讨,2000(5):66-70.
-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81.
- [18]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9.
- [19]吴康宁.“被抛放”的儿童:审视与反思[J].教育研究,2023(11):53-65.
-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9.
-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 [22]许文静,方明.孔子群己和谐思想的当代启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7-20.
- [23]叶飞.当代道德教育的三重理性向度——兼论如何培育理性的道德人[J].南京社会科学,2019(7):140-146.

## Premis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The Coupling and Co-construction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nd Public Individuals Cultivation

LYU Wen-huan, WEI Ji-cai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purpose of the proposition of coupling moral education and public person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reverse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coupling and isomorphism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has realistic premise and logical mechanism, that is to say, in the optimization of education structure, the two are extended, different and mutual, effectively embedded into each other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ach other's whole structure; In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the two attributes are connected, and in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two gene attributes to achieve mutual empowerment and stimulate the doubling effect of functional superposition; They are not value-neutral tools in the ethical norms of education, bearing the ethical norms, moral constraints and other value loads. In the post-rural society, th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upl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needs to solve the three obstacles, that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scale imbalance of "Group" and "Self", the deviation of "Same" and "Different", and the one-dimensional difficulty of discourse power.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such as from polarization of "Group" and "Self" to "Scale balance", from "Mastery of agreement" to "Respect for heterogeneity", from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to "Coexistence", finally, the author expects that the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man will co-build and produce the coupling effect of "1 + 1 > 2".

**Key words:** post-rural society; school moral education; public person; coupling